

基于辩论的教育和基于教育的辩论

何若灵

上海民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

[摘要]辩论赛是一项以“说服效果”为评价标准的语言竞技活动。参与辩论赛活动的学生一般根据抽签被分为“正方”“反方”两个持方，正反双方就某个具有价值冲突的“辩题”展开有特定流程和规则的辩论，而比赛的胜负则由“第三方”评委根据双方的说服效果进行裁决。中学生辩论赛，和基于中学生辩论赛的辩论教育横跨我国基础教育三类课程，对学生语言表达、逻辑思维、问题研究、团队合作等多种能力的培养都有帮助。

[关键词]辩论；教育；说服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9.753

上海的中学生辩论活动有多年的传统。2001年到2010年，上海市少科站举办过每两年一届的官方市级比赛“英特尔杯”名校环保辩论赛。近年来，“上海杯”“亚洲杯”“联合会杯”等中学生辩论赛事涵盖了上海初、高中辩论赛的各年龄段。笔者从事中学生辩论教育15年，曾带队参加“东吴杯”全国中学生辩论赛、“精英杯”亚洲中学华语辩论公开赛、“亚洲杯”中文辩论锦标赛等赛事，指导队伍参赛超过130场，并从2007年到2017年，连续创办了“远向杯”上海市中学生辩论邀请赛、“杨知杯”上海市中学生知识产权主题辩论赛、上海市中学生辩论联赛等一系列赛事，赛事规模最高达到24校。通过长期的辩论教育实践，笔者认为，辩论赛，和基于辩论赛所开展的辩论教育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很好的项目化学习过程，而学生基于辩论的学习效果则与辩论活动主办方、教练等辩论教育的实践者息息相关，辩论赛应当基于胜负并超越胜负，体现教育的活力，实现教育的目的。

一、基于辩论的教育让学生的学习充满鲜活旺盛的生命力

辩论赛的很多辩题都天然地是跨学科的真实问题。参与辩论活动，使学生上了一个认知更大、更鲜活真实世界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同学们通过“设计论点”让自己对世界的认知结构化，通过辩论攻防理解和一种不同于自己既有经验的认知角度，并有机会对它进行思辨和验证。这样的学习过程不同于学校课堂里接受式的学习体验，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2012年，笔者带学生赴马来西亚参加第五届“精英杯”亚洲中学华语辩论公开赛。前两轮的辩题是“马来西亚是否应该废除国产电影强制上映制度”。为了准备这个辩题，笔者带着学生们运用信息技术，对马来西亚相关网站进行了大量的信息检索，统计了从2002年到2012年马来西亚电影市场从电影投资到票房，从影院规模到观影人数的各项信息，并基于这些数据对马来西亚国产电影在整个电影市场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和推断。学生在信息检索和分析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个他们之前不曾接触的领域。而相似的学习过程，也被用于2014年“马来西亚是否应该管制城市私家车流量”和2017年“马来西亚是否应该废除旅游税”这样的辩题准备中。通过辩论赛，学生们不仅学习和实践了信息检索的信息科技学科素养，也在认知和解决一个又一个真实问题中学会如何分析概念、结构问题、理性思考。

2013年，笔者所带的队伍以卫冕冠军身份参加第二届“东吴杯”全国中学生辩论赛，却在小组赛中两连败，铩羽而归。输了比赛，学生们当然情绪低落。笔者在一番心理建设后，要求队中的两位主力队员用暑假剩余的时间全文阅读《三国演义》，并赋予他们在开学后的上海中学生辩论联赛中以助理教练身份指导低年级同学的责任。赢下比赛证明自己的强大动力让中学生辩手们勇敢地把自己扛在了自己肩上，他们以辩题

“隆中对是纸上谈兵还是切实可行”的问题为导向，精读《三国演义》并在比赛中大放异彩。在辩论活动中，构建起“学长姐——学弟妹”的学习社群是极具生命力的学习策略。高年级同学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成为指导老师的“助教”，在老师和新生之间“翻译”论点和问题，是很有挑战性的主动学习过程。而从辩论的胜负中品尝研究性学习的滋味，是中学生辩手们乐此不疲的不竭动力。

2017年，第十届“精英杯”亚洲中学华语辩论赛小组赛第三轮，辩论双方讨论“荆轲是否应该刺杀秦王”，笔者带着同学们认真研读《史记-刺客列传》，惟妙惟肖地描摹、还原太子丹与荆轲谈话的场景，在比赛中，一位辩手把荆轲受太子丹之托和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对比，说到动情处，直接在赛场上讲台前做出一个跳劈的动作，爆笑全场。在这一场充满表演趣味的比赛中，辩手们仿佛将自己置身于他们所理解论点的世界里，与千年之前的古人直接对话，妙趣横生。

辩论赛的辩题涉及文学、历史、科学、体育、公共政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笔者曾在自己主办的上海中学生辩论联赛中引入四大名著辩题——曹操是不是一个好丞相、唐僧是不是一个好领导、吴用是不是一个好军师、贾政是不是一个好父亲；也曾设计科幻脑洞题——人类是否应该研发时光机、人类是否应该寻找外星人；探讨过中国国足还是巴西国足主教练更难当，也争论过随迁子女是否应该允许参加中高考、上海高考是否应该加试体育。每一个辩题都是同学们看见这个世界的一扇窗户。基于辩论的教育让同学们对世界充满旺盛的好奇心、强烈的责任感和理性的思索。

二、基于教育的辩论是辩论教育实践者应有的眼界和格局

辩论赛是一项分胜负的竞技活动。在辩论赛中，求胜的动力恰恰是很多辩手们学习相关知识、提升思辨水平的重要驱动力。但对辩论赛的组织者和辩论活动的教育者（教练）来说，则不能局限于胜负，需要有超越胜负的眼界和格局。

2006年，笔者以教练身份第一次指导中学生辩论活动，却在第三届“英特尔杯”名校环保辩论赛中首轮负于宜川高级中学。当时官方市级赛事英特尔杯两年一届，下次比赛到来时这些孩子已升入高三，不再有机会参与活动了。笔者主动承担起了主办上海市民间市赛的责任。2007年初，第一届“远向杯”上海市高中辩论邀请赛拉开帷幕，四所学校参与比赛。从2007年到2012年，参赛学校规模也从最初的四所扩展到了二十四所，涵盖了宝山、杨浦、虹口、静安、长宁、浦东等多个区。笔者一个小小的初心，为许多中学生走进辩论搭建了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08年12月，笔者在首届国际中学华语辩论赛上感受到马来西亚中学辩论的强大。在2009年的第三届“远向杯”上，笔者将上海高校辩论资源引入中学，为前来参赛的每一所学校配置了大学辩手做教练，笔者

所指导的队伍丢掉了此前两年蝉联的冠军，却自此带来了上海中学生辩论整体水平的提升。

2013年，笔者有感于此前笔者所主办的民间市赛为淘汰制的锦标赛，每一轮之后都会有一半的队伍退出角逐，也就失去了继续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在结束第二届“东吴杯”回到上海之后，笔者将原先的杯赛模式变革为联赛模式，举办了第一届上海市中学生辩论联赛。第一期有15所学校参加，分成三个小组，同一个小组内的五支队伍以单循环模式与其他四支队伍分别进行一场比赛。如此一来，无论单场比赛的胜负结果如何，每支队伍都有四场比赛可打，极大地增加了各所学校参与辩论活动的机会，让更多的高中生成得已登场亮相、学习交流。从2013年到2017年，联赛共开展了五个赛季，每年不但有超过20所上海学校参与活动，而且吸引到苏州、无锡、镇江等周边地区的中学来沪交流比赛。从杯赛到联赛，一字之变，体现的是从主办方视角到学生视角的转变，是从以“求胜”为核心到以“教育”为核心的转变。

2015年，笔者所带辩论队的同学们在第八届“精英杯”亚洲中华语辩论赛上收获了惨烈的三连败。一时间，队伍的氛围凝固到了冰点。笔者作为教练也在反思怎样能把工作做得更好。笔者意识到，随着年龄、阅历和辩论赛执教经验的增长，自己和新接触辩论的学生之间经验的鸿沟会越来越深。如果沿用过去主要让学生理解教练论点的交流方式，会造成两方面问题：一是由于教练想到的论点和给出的材料超出学生经验和学习的最近发展区，学生在学习中只知其表未知其里，到了比赛中也只会机械操作，无法自主应变，也就失去了自己理解、应用论点进行学习的机会。二是学生会越来越依赖教练，失去用自己的经验、能力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失去了主动学习和思考的意愿和动力。因此，笔者在之后的执教过程中转换了思路，提倡学生“创造性地理解教练论点”——学生不必勉强理解教练对论点的解释，但需要用自己的经验和常识解读、诠释论点。笔者作为教练，进入到同学们举的例子和场景中交流、引导他们理解论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学生不需要（也不可能）成为教练，但可以通过“创造性的理解”成为最好的自己。从学生进入老师的认知场域进行理解和学习辩论，到老师进入学生的认知场域理解和指导辩论，这一小小的变化，彻底激活了笔者所在的辩论课堂。从那时起，笔者所在的辩论队每一届都呈现出极具个性的风采和特色，被精英杯的评委们戏称为“百花齐放”。

基于教育的辩论，需要辩论活动的组织者和辩论队教练、老师本着教育的目的开展辩论活动。在笔者的办赛和辩论教育实践中，看到过太多“教练比队员更想赢下比赛”的场景。在这种以求胜为最优先目标的情况下，参与辩论的同学们的成长多少是被舍弃的——学生可能因为基础不够好而被淘汰出队；辩手可能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却得不到教练的聆听和理解；教练包办比赛准备，队员只能像提线木偶一样机械执行教练灌输的论点；评委点评只给出自己投选胜负的依据却忽略了给对方辩手对辩题所涉及真实问题的分析和引导。在这些场景中，同学们参与辩论活动的收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基于教育的辩论，则需要辩论的组织者在设计辩题时考虑到学生的经验、常识，考虑到用辩题引导学生探究和学习的功能；需要辩论队教练抱着开放的心态聆听和理解同学们对辩题所涉及问题的理解和认知，进入学生认知场域引导和启发他们，而非以自己的经验给出一个套路化的操作模板。基于教育的辩论，既要

让同学们“知其然”，也要让他们“知其所以然”。毕竟，中学生参与辩论活动，求胜只是手段，更好的认识世界才是最终的目的。

三、写给方兴未艾的上海初中辩论教育

2018年，笔者来到现在所任职的学校，更多地投身初中生辩论教育。此前的十余年，上海的辩论教育主要集中在高中阶段，但对初中生参与辩论，笔者也并不陌生。2008年，笔者带队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首届国际中华语辩论赛，在那届比赛上，来自马来西亚关丹丹那布爹中学的林少桦同学以初三年级的学籍，打出了极其高光的表现，在为队伍夺得亚军的同时，与冠军吉隆坡循人中学高三年级的周芷盈同学同获“全程最佳辩手”称号。同样是在2008年，吉隆坡循人中学初一年级的刘璞同学带着循人中学二队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第一届“精英杯”的冠军和全程最佳辩手，2012年，笔者带队获得第一届“东吴杯”全国中学生辩论赛冠军时，队中的四辩贺艺菁同学只有初一，而这位贺艺菁同学从初一入队，到高三毕业，参与了三届“东吴杯”、四届“精英杯”和多届上海地区赛事，为学校获得了2012年“东吴杯”全国赛冠军、2016年杨浦区赛和上海市赛的冠军。大量案例表明，虽然初中辩手在语言表达的经验、心智水平、知识积累上相较于高中辩手有差距，但经过学习、训练和比赛磨砺，完全有机会达到现有高中生辩手中的较高水平。

问题主要来自学习和锻炼的平台。目前上海初中生辩手参与辩论赛的主要机会，仍然是来自于中高级别的比赛。包括笔者目前所在的学校在内，上海不少初中学校会举办校内的辩论活动，但学校之间的辩论交流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可喜的是，现在正有越来越多的辩论赛主办方开始注意到初中生参与辩论活动的客观需要和可行性。2020年的暑假，进行到第六年的“亚洲杯”华语辩论邀请赛开启了B组（17周岁以下）和C组（14周岁以下）赛事，一项专门针对初中生的地区以上级高水平辩论赛终于到来。笔者带队参加了这届赛事的C组比赛，亲眼目睹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的初中同学们围绕“观光性动物园应不应该存在”“日本应不应该坚持举办第23届夏季奥运会”、“在学习过程中，快乐是不是必要的”等辩题展开的一场场精彩、激烈的辩论。笔者所指导的学生们也在赢下C组冠军后写下了一篇篇深情、动人的赛后感，以此记录他们的成长。接下来，举办了三届的“上海杯”、和原本只针对大学队伍的“华语辩论世界杯”都打算在下一届的辩论赛中开设初中组，而如上海广播电视台、“Kids peak 孩子说”也开始更多举办面向初中生的演讲、辩论类口语表达活动。这是一件让人欣喜的事情，这意味着基于辩论的教育和基于教育的辩论正在得到全社会更大的认可，而笔者作为一个从事中学生辩论教育十多年的中学老师，感到无比欣慰。

复旦大学辩论队在1993年狮城舌战载誉而归后总结说，“辩论赛的胜利是读书的胜利”。我们的孩子们将在参与辩论活动的过程中学会学习，学会共情他人，理解世界，而我们的中学教育也一定会因为辩论赛这一丛美丽鲜花的盛开更显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 李人. 教育辩论：历史、内涵、价值与实践[J]. 泰山学院学报. 2021, 43(04)